解放新聞

第十八期

2026年5月（上）

为了革命！为了解放！为了社会主义！

目录

纪念五一劳动节 1-10

纪念欧战胜利81周年 11-14

论天硕幼儿园罢工 15-19

论江西樟树事件 20-24

纪念五一劳动节

一、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纪念碑

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不是资本家恩赐给工人的休息日，也不是脱离阶级内容的普通节日，而是国际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产物，是劳动人民反抗资本压迫、争取自身权利的历史纪念碑。它所记录的，不仅是工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一场斗争，更是现代无产阶级逐步认识自身力量、走向联合和组织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把分散的生产者集中到工厂、矿山和铁路之中；另一方面，也把广大劳动者变成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工人不占有厂房、机器、土地和原料，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维持本人和家庭生活的工资。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剩余价值，总是力图延长劳动日、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把工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纳入资本增殖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十二小时、十四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劳动十分普遍。工人不仅要忍受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还要面对工伤、疾病、失业和贫困的威胁。妇女和儿童同样被大量投入生产，被迫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资本主义表面上把工人与资本家说成“自由和平等”的契约双方，但这种所谓自由，不过是工人“自由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这种所谓平等，也掩盖不了生产资料占有者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之间实际的不平等。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工人运动最早、最广泛的要求之一。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并不只是为了让工人获得几个小时的休息，而是工人反抗资本无限占有其生命时间的斗争。工人要求把一天分为八小时劳动、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自由支配，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人的生命究竟应当服从资本增殖，还是应当用于人的全面发展？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迅速发展。1886年5月1日，大批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芝加哥成为斗争的重要中心。随后发生的镇压以及工人运动者遭受的迫害，进一步暴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平时把自己的国家说成超越阶级、代表全民的公共机关；然而当工人真正组织起来、触动资本利益时，警察、法庭、监狱和刑罚便立即被用来维护资本的统治。

芝加哥工人的斗争和牺牲震动了国际工人运动。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国际性的五月一日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从此，五月一日逐渐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共同斗争的日子。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工人，在这一天提出共同要求，表明他们面对着共同的压迫者，也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产生，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了世界市场，把各国经济连接在一起，也使资本能够跨越国界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高的利润。资本家经常利用民族、国籍、肤色和宗教的差别分裂工人，煽动一国工人敌视另一国工人，使劳动者彼此竞争，而资本则从这种分裂中获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是一句抽象的道德口号，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中得出的革命结论。既然资本的统治具有国际性，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一个国家的工人不能把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作敌人，而应当把他们看作反对资本统治的阶级兄弟。五一正是这种国际团结的集中表现。

因此，五一从来不是一个只歌颂“勤劳”的节日。资本家同样赞美勤劳，因为他们希望工人更加服从、更加卖力地为资本创造利润。资产阶级可以赞美抽象的劳动，却绝不会主动承认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它赞美劳动者的奉献，却回避劳动成果被谁占有；赞美工人的辛苦，却回避谁从这种辛苦中获利；赞美劳动光荣，却不愿回答为什么创造财富的人长期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劳动，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劳动。我们不仅要问人们是否劳动，还必须问：劳动是在什么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劳动者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归谁所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还是实现资本利润？如果这些问题被回避，那么所谓“尊重劳动”，就很容易变成要求工人忍受剥削、服从管理、继续为资本牺牲的空话。

今天，资产阶级不断试图抹去五一的阶级内容。在一些地方，五一被变成消费促销、旅游休假和商业庆典；在另一些地方，它被包装成资本家和工人共同庆祝的“和谐节日”。这种解释把五一的历史颠倒了。五一不是劳资合作的产物，而是劳资斗争的产物；不是阶级矛盾消失的证明，而是阶级矛盾长期存在的见证。

纪念五一，首先必须恢复它的真实历史。我们应当铭记，工人的一切权利都不是资本主动给予的。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建立工会、获得社会保障，这些成果无一不是劳动群众经过罢工、示威、组织和牺牲争取来的。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形成强大压力时，才会作出有限让步；而当工人组织削弱时，资本又总是企图收回这些让步。

因此，五一的意义绝不只是回顾过去。它提醒今天的劳动者：任何孤立的个人在资本面前都是软弱的，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能够成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工人只有摆脱彼此竞争，克服行业、地域和国籍的分裂，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才能有效地保卫自身利益，并进一步改变产生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

五一的旗帜，是工人团结的旗帜，是阶级斗争的旗帜，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真正纪念五月一日，就必须坚持它的战斗传统，反对资产阶级对其历史的篡改，反对把工人斗争变成无害的节庆仪式。我们纪念过去的斗争，不是为了停留在怀旧和感伤之中，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把前人的斗争继续推进下去。

五一告诉我们：劳动人民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人阶级不是只能忍受压迫的群体，而是能够组织起来、改变社会的力量。只要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仍然存在，只要少数人仍然占有生产资料、支配多数人的劳动，五月一日就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它将继续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为自身的权利、尊严和最终解放而斗争。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

五一国际劳动节之所以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并不是平等合作的两种力量，而是处在根本对立的社会关系之中。工人阶级创造社会财富，资本家阶级却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生产过程，占有劳动成果，并把工人的剩余劳动转化为自己的利润。只要这种生产关系没有被消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通过抽象的“和谐”得到解决。

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相分离。厂房、机器、土地、原料、运输工具和货币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广大劳动者不占有足以独立生活和生产的条件。工人表面上是自由的，可以选择把劳动力出售给不同的资本家；但实际上，如果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获得维持本人和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

因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劳动契约，虽然在法律形式上表现为两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交换，但在社会内容上却建立在深刻的不平等之上。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可以等待、选择和支配；工人则必须不断出售劳动力，否则就会面临失业、贫困和生活危机。这种所谓自由，是工人被迫在不同资本家之间选择雇主的自由，而不是摆脱雇佣劳动制度的自由。

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满足工人的生活需要，也不是为了抽象地发展社会生产，而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工人在一个工作日中，一部分时间生产相当于自己工资价值的产品，另一部分时间则为资本家无偿创造剩余价值。工资把这种关系掩盖起来，使整个工作日看上去都像是得到了报酬，实际上资本家的利润、利息和地租，归根到底都来自劳动者创造而未被劳动者占有的剩余劳动。

这说明，资本主义剥削不是简单的欺骗，也不只是个别资本家贪婪或残忍造成的。即使某个资本家性格温和，按时发放工资，甚至给予工人一些福利，他仍然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经营企业。他必须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压缩工资支出并扩大剩余价值，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其他资本击败。

因此，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具有制度性。资本家个人不过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承担者。资本要求不断增殖，要求今天投入的价值在明天变成更多的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必须不断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采用更加严密的管理制度，并用机器和技术降低单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成本。

在工人斗争迫使资本缩短法定劳动时间之后，资本并没有停止剥削，而是转向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工人可能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过去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生产节奏更快，休息时间更少，管理更加严格，劳动过程被分解得更加细密。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通过绩效考核、数字监控、计件工资、算法派单和即时排名，把工人的每一分钟都变成可以计算和压缩的成本。

技术和机器本来是人类劳动创造的成果，本应被用来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扩大社会成员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首先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存在。资本家采用机器，不是因为机器能够使工人生活得更轻松，而是因为机器能够降低工资成本、提高剩余价值，并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结果是，技术越发展，工人未必越自由。自动化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却可能带来失业、降薪、劳动岗位不稳定和劳动强度提高。一个工人使用更先进的设备，可以完成过去数名工人的工作，但由此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并不会自动归还给工人。资本往往裁减部分工人，让留下的人承担更多任务，而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收益则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占有。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满足人民需要，而是实现利润。只要某种商品能够带来利润，资本就会投入生产；只要某种社会需要不能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资本就可能对它置之不理。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一方面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仍然存在贫困、失业、住房短缺、医疗不足和基本生活资料分配不均。

这种矛盾并不是因为社会生产力不足，而是因为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使生产越来越社会化。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相互协作，共同完成生产过程。任何一种现代商品，往往都是许多行业和无数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结果。但是，生产成果却由私人资本占有，生产决策则服从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利润要求。

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表现。生产越发展，劳动分工越复杂，社会协作越广泛，资本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也越深入。工人的劳动已经不是孤立的个人劳动，而是整个社会劳动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工人仍然不能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劳动成果如何分配。

资本主义制度还不断制造失业人口。失业不是资本主义运行中的偶然故障，而是资本维持对工人统治的重要条件。大量失业者和不稳定就业者的存在，使在职工人面临随时被替代的威胁。资本家可以利用工人之间对岗位的竞争压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并迫使工人接受更加恶劣的工作条件。

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资本统治劳动的结果。资本家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国籍和不同身份的劳动者放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中，使他们为了有限的岗位彼此竞争。资产阶级随后又把低工资和失业归咎于外来工人、移民、妇女或其他劳动群体，以掩盖资本制度本身对劳动者的剥削。

马克思主义要求工人看清，真正的矛盾不在于一个工人是否抢走了另一个工人的岗位，而在于资本掌握生产资料并支配劳动。工人之间越是相互排斥，资本就越容易压低所有人的工资；工人之间越是团结，资本就越难以利用差别分化劳动群众。因此，反对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不只是道德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需要。

资本积累还必然导致财富和权力不断集中。资本家把获得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生产，扩大企业规模，引进新的机器，吞并弱小竞争者，从而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垄断资本。少数大企业和金融集团可以控制市场、影响国家政策，并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整个社会的利益。

与此同时，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资本的力量就越强。工人生产出来的机器、厂房、商品和利润，反过来成为支配工人的力量。劳动者创造了资本，但资本却以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站在劳动者面前，决定他们能否就业、工资多少、何时劳动以及以何种方式生活。

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重要表现。工人生产的产品不属于自己，劳动过程也不由自己控制。劳动不再主要表现为人的能力的自由发挥，而是成为维持生存的强制手段。工人往往只有在离开工作之后才感到自己属于自己，而在劳动过程中则服从于机器、管理者、订单、指标和资本的要求。

资产阶级经常宣传，只要工人努力劳动、学习技能、提高效率，就能够改善命运。这种说法把社会制度造成的问题归结为个人能力不足。事实上，即使某些工人通过个人奋斗改善了处境，整个工人阶级仍然不能依靠个别人的上升摆脱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需要大量普通劳动者，也需要维持不同工资水平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别。

工人阶级的解放不能依靠少数工人变成资本家，而必须依靠整个阶级消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真正的问题不是让每一个工人都有机会成为剥削者，而是消灭少数人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支配多数人劳动的制度。

当然，工人阶级必须坚决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任意解雇和维护社会福利。任何轻视日常经济斗争的观点，都会使工人失去保卫自身利益的现实手段。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指出，这些斗争只能限制资本的剥削，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剥削。

工资提高以后，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劳动时间缩短以后，剩余价值生产仍然存在；福利制度改善以后，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在经济危机、战争或政治反动时期，还会重新夺回工人曾经争得的成果。因此，经济斗争必须同更广泛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工人阶级必须从改善自身被剥削的条件，上升到消灭产生剥削的社会制度。

五一的现实意义，正是在于提醒劳动者认识这种根本矛盾。它不仅要求社会尊重工人的劳动，更要求追问劳动成果归谁所有；不仅要求资本家减少压迫，更要求工人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更要求结束劳动受资本支配的制度。

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正因为工人被集中在共同劳动之中，接受大生产的组织和训练，他们也具备联合起来、重新组织社会生产的客观条件。资本主义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创造了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

因此，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不可能通过资本家的善意得到最终解决，也不可能依靠劳资双方永久妥协而消失。资本的存在以占有剩余劳动为条件，工人的彻底解放则要求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二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

纪念五一，就必须揭露这种对立，反对用抽象的“共同发展”“企业家庭”和“劳资一体”掩盖阶级矛盾。工人和资本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达成暂时协议，但这种协议不能改变资本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出售劳动力的事实。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工人阶级就必须进行独立的阶级斗争。

五一不是要求劳动者永远做更好的雇佣工人，而是号召劳动者争取成为社会生产的真正主人。只有当生产资料从少数资本家手中转归社会所有，生产不再以利润而以人民需要为目的，技术进步不再制造失业和贫困，而是用于缩短劳动时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劳动才能真正摆脱资本的奴役，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

三、工人阶级必须从自发经济斗争上升为自觉政治斗争

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迫使工人进行斗争。工资下降、劳动时间延长、工作强度提高、任意解雇、工伤事故和福利削减，都会使劳动者采取请愿、罢工、集会和组织工会等行动。工人为了维护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进行的经济斗争，是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工人逐步认识自身力量、学习团结和组织的重要学校。

一个孤立的工人在资本家面前往往是软弱的。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和就业机会，可以用解雇、降薪和替换劳动力来压迫个人工人。只有当工人停止彼此竞争，联合起来提出共同要求时，才可能对资本形成实际压力。罢工使工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工厂、铁路、矿山、港口和商业体系并不是依靠资本家的命令自行运转，而是依靠千百万劳动者的共同劳动维持的。

因此，经济斗争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工人在斗争中逐渐懂得，个人遭受的不公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整个雇佣劳动制度的普遍现象；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也不是由资本家的好心决定的，而是由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斗争能够打破劳动者的孤立状态，使他们从分散的个人成长为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力量。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把自己的斗争局限于经济要求。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待遇，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的剥削，却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只要资本家仍然占有生产资料，只要工人仍然必须出售劳动力，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根本关系就没有改变。

经济斗争所直接处理的，通常是劳动力出售的条件。工人要求资本家为劳动力支付更高的价格，减少对劳动力的过度消耗，或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障。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但即使工人的工资提高，资本家仍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即使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工人仍然不能决定生产的目的和劳动成果的分配。

如果工人运动只停留在经济斗争范围内，它就容易形成工联主义倾向。工联主义承认工人应当组织起来争取工资和福利，却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看成不可改变的前提。它要求工人在现存制度内获得较好的待遇，而不要求工人阶级推翻资本的政治统治。这样的运动即使具有战斗性，也可能最终被限制在资本主义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资产阶级并不一定反对一切工会和工人组织。当工会只负责调解劳资纠纷、约束工人行动、维持生产秩序时，资产阶级甚至可以承认和利用它们。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允许工人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提出部分要求，同时禁止他们触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国家政权问题。这样，工人的反抗就可能被转化为周期性的谈判，而资本主义制度则继续存在。

因此，工人阶级必须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所谓政治斗争，就是工人阶级不仅反对个别资本家，而且反对维护整个资本家阶级统治的国家制度、法律体系和政治机构。工人必须认识到，在每一个企业主背后，都站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

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超越阶级、平等代表所有人的中立机关。它在形式上可以宣布公民平等，可以设立议会、法院和选举制度，但它所保护的根本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法律保护资本家对工厂、土地、银行和机器的占有，同时把工人为了生存而出卖劳动力的状态宣布为自由契约。

当工人的斗争没有威胁资本统治时，资产阶级国家可以表现出妥协和宽容；但当罢工扩大、群众运动发展、工人开始挑战私有财产和国家权力时，国家的强制性质就会更加明显。警察、法院、监狱、军队和行政机关，都可以被用于镇压工人运动、保护资本财产和恢复资产阶级秩序。

国家机器之外，资产阶级还通过学校、媒体、宗教机构和各种社会组织传播自己的思想。它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说成人类社会唯一合理的制度，把个人竞争说成人的自然本性，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才能和风险的回报，把工人的贫困说成个人不够努力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资产阶级不仅依靠强制统治，而且依靠思想影响维持统治。

资产阶级思想不会因为工人遭受剥削而自动从工人的头脑中消失。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同样受到个人主义、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宗教观念的影响。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工人可能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个别坏资本家、外来工人、机器发展或偶然政策，而不能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规律。

自发斗争能够使工人认识到资本家的压迫，却不能自动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意识。工人可能要求更公平的工资，却仍然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经过修补而永久合理地运行；可能反对某一项政策，却仍然接受资产阶级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说法；可能在企业内部团结起来，却在民族、宗教或国籍问题上受到资产阶级分裂宣传的影响。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政治斗争不可缺少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帮助工人从局部经验上升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认识，从反对个别压迫上升到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统治。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说明，工人的贫困不是个别政策失误造成的，而是资本积累的结果；经济危机不是管理不善的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爆发；战争也不只是某些政治家的错误选择，而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资源和势力范围密切相关。

政党还必须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工人斗争连接起来。资本主义把工人分散在无数企业和行业中，使他们首先看到本单位、本行业的直接利益。无产阶级政党则要使工人认识到，各种局部斗争具有共同的阶级根源，只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力量，才能同整个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可以脱离群众，以少数人的命令代替工人的实际运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深入工厂、矿山、社区和群众组织，了解劳动者的现实处境，把社会主义目标同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联系起来。它既不能迎合群众中的落后观念，也不能用抽象口号代替耐心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

政党应当参加工人争取工资、工时、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每一场正义斗争，并在斗争中说明这些问题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联系。通过具体斗争，劳动者能够检验不同政治力量的立场，认识国家和资产阶级的真实性质，并逐渐形成更加明确的阶级意识。

工会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工会把同一行业或企业中的劳动者组织起来，是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基本组织形式。没有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工人就容易重新陷入分散和孤立。但是，工会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全部，更不能代替无产阶级政党。

工会主要按照行业和经济利益组织工人，而政党则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工会可以组织某一企业的罢工，政党则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阶级力量和政治方向；工会可以同资本家谈判劳动条件，政党则必须领导工人争取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工会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它就可能被改良主义官僚控制。这些官僚把维持组织机构和谈判地位看得高于工人斗争本身，害怕群众行动破坏他们同政府和资本家的合作关系。他们可以利用工人的会费和信任建立个人地位，同时压制基层工人的战斗要求。

改良主义把资本主义国家描绘成可以被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工具的中立机构，认为只要通过选举获得足够多的议席，实施税收、福利和国有化政策，就能够和平消除阶级矛盾。然而，历史反复表明，资产阶级能够接受不触动其根本统治的改革，却不会自愿放弃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

工人通过议会斗争争取有利政策，是可以利用的斗争形式，但议会活动必须服从于阶级斗争的总体目标。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把选举胜利等同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也不能为了赢得选票而放弃社会主义原则。议会只是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部分，真正的社会力量仍然存在于阶级组织、群众运动和生产领域之中。

机会主义的危险，正是在于它以现实和务实为名，逐步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机会主义者可能承认社会主义是遥远目标，却在每一个现实问题上要求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秩序；可能口头承认阶级斗争，却在斗争尖锐时要求工人保持克制；可能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却把革命理论变成装饰。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反对这种倾向，坚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工人阶级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同其他社会力量采取共同的行动，但不能把自己的组织和政治纲领交给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任何联盟都必须以维护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和长远利益为前提。

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还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和战争政策转移阶级矛盾。当国内危机加深时，统治阶级常常煽动对外仇恨，把劳动人民的贫困归咎于其他民族和国家，要求工人为资本家的利益承担战争代价。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揭露这种欺骗，坚持各国工人之间的国际主义团结。

工人没有兴趣为本国垄断资本争夺市场、殖民地和资源。战争中的利润归军火资本、金融资本和大企业所有，而死亡、伤残、税收和贫困则由劳动人民承担。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结合起来。

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并不意味着放弃眼前利益，而是要求把眼前斗争置于更广阔的目标之中。每一次罢工、每一次反对削减福利的行动、每一次维护公共服务的群众运动，都可以成为提高工人组织程度和政治觉悟的机会。

关键在于，这些斗争不能只以恢复原有秩序为终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断说明，即使某一次斗争取得胜利，资本仍然会寻找新的方式转嫁危机和加强剥削。只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从根本上结束资本对劳动的支配。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建立少数人的新特权，而是为了剥夺剥夺者，把主要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按照劳动人民的需要组织生产。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是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消灭产生阶级差别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少数政治家从上面实施的福利方案，而是工人阶级自觉斗争的结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组织、觉悟和主动参与，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是用党代替阶级，而是通过理论、纲领和组织，使工人阶级能够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行动。

五一国际劳动节应当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教育和组织动员的重要时刻。在这一天，劳动者不仅要提出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的要求，还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矛盾，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政策，表达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纪念五一，就要反对把工人运动限制在无害的节庆和象征性活动之中。游行、集会和口号只有同实际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持久力量。真正的纪念，应当推动工人建立基层组织，加强行业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培养先进分子，提高政治觉悟，并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

资本主义不会因为工人的苦难自动灭亡，也不会因为社会矛盾尖锐而自行让位于社会主义。只有当工人阶级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党，把分散的斗争统一为有明确目标的政治运动，才能把资本主义危机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因此，工人阶级必须从为改善劳动力出售条件而斗争，上升到为消灭劳动力商品制度而斗争；从反对个别资本家的压迫，上升到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争取局部改革，上升到争取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

这正是五一战斗传统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工人只有组织成为独立的阶级，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政党，才能不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被统治者，而成为创造新社会的领导力量。

四、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和劳动解放

五一国际劳动节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行业的工人，而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它所表达的，是各国劳动者反对资本剥削、政治压迫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共同意志，也是工人阶级超越国界、民族和种族差别，实现国际联合的伟大象征。

资本主义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一国之内。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不断突破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原料、市场和投资机会。跨国公司把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国家，金融资本在世界各地流动，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经济控制、政治干涉和军事压力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

资本可以跨越国界追逐利润，工人阶级的斗争也不能停留在狭隘的民族范围内。如果各国工人彼此敌视，争相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以换取资本的投资和订单，那么资本就能够利用这种竞争削弱劳动者的力量。一个国家工人待遇的下降，往往会被资本用来压迫其他国家的工人；一个地区劳动权利遭到破坏，也可能成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进攻的起点。

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友爱口号，而是工人阶级反对国际资本的现实需要。各国工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他们同样不占有生产资料，同样必须出售劳动力，同样受到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的支配。他们的根本敌人不是其他国家的劳动者，而是本国和国际资本的统治。

资产阶级总是企图破坏这种团结。它利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偏见和排外情绪，把失业、低工资和公共服务危机归咎于外来工人、移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体。它让劳动者为有限的岗位和福利彼此争夺，却掩盖少数资本家占有巨大财富、控制社会资源的事实。

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这种分裂工人的政治。一个工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是什么民族、肤色或宗教背景，只要他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就同其他工人具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工人阶级只有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维护所有劳动者的平等权利，才能形成真正有力量的阶级联合。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要求工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表面上常常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文明使命或保卫和平为名，实际上却同垄断资本争夺市场、资源、运输线和势力范围密切相关。资产阶级煽动劳动人民为“祖国利益”牺牲，但它所说的祖国利益，往往只是银行、军火商、能源集团和垄断企业的利益。

战争给资本家带来订单、资源和市场，却给劳动人民带来死亡、流离失所、物价上涨、税收增加和社会福利削减。各国工人被驱赶到战场上彼此残杀，而真正从战争中获利的人却远离前线。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坚持各国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

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否认民族压迫和民族解放问题。恰恰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干涉和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获得真正自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工人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的压迫，维护各民族平等和自主发展的权利。

但是，民族解放只有同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彻底意义。如果民族独立只是把外国资本家的统治变成本国资本家的统治，广大工人和农民仍然处在剥削之下，那么劳动人民的解放就没有完成。无产阶级必须在民族斗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本国剥削阶级结合起来。

今天，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深刻矛盾。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科学技术能够生产足够的食品、住房、药品和生活资料，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然而，世界上仍然存在大规模贫困、失业、饥饿和无家可归。大量商品因卖不出去而被销毁，许多人的需要却因没有支付能力而得不到满足。

这说明，问题不在于社会缺少生产能力，而在于生产受资本利润支配。资本主义不是按照社会需要组织生产，而是按照利润率的高低决定投资。只要无利可图，人民再迫切的需要也可能被忽视；只要能够获利，即使生产浪费性、破坏性甚至危害社会的商品，资本也会不断扩大生产。

资本主义危机正是这种制度矛盾的集中爆发。企业并不是因为社会已经不需要商品而停产，而是因为商品无法按照有利可图的价格出售。工人一方面因为失业而失去收入，另一方面又因为没有收入而无法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生产能力被闲置，机器停止运转，劳动者陷入贫困，而社会需要却仍然大量存在。

资产阶级把危机的代价转嫁给劳动人民。它通过裁员、降薪、削减社会福利、私有化公共服务和提高生活成本来恢复利润。国家则使用公共资金挽救银行和大企业，同时要求普通劳动者接受紧缩。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全民利益”，在危机中总是让位于资本的根本利益。

工人阶级不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恢复繁荣之上。资本主义的繁荣是下一次危机的准备，资本积累越发展，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不平等就越严重。即使在经济增长时期，财富也主要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广大劳动者仍然面临工作不稳定、住房困难和公共服务恶化。

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解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要求把大工业、银行、交通、能源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从少数资本家手中夺回，转变为社会所有，由劳动人民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

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地由国家管理资本主义企业，也不是在保留资本统治的前提下扩大福利。关键问题在于国家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由谁管理，又为谁服务。只有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才能真正打破资本的经济和政治统治。

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剥夺大资本的生产资料，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建立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新型生产关系。它必须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参与，组织生产、监督管理、发展教育和文化，使国家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改造社会的工具。

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不是让国家成为一个更大的资本家，也不是用官僚命令代替资本家的命令，而是逐步消灭剥削、失业、贫困和阶级差别。劳动人民应当越来越广泛地参与企业管理、经济计划和国家事务，使社会生产真正处在生产者的共同控制之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才能真正服务于劳动人民。机器和自动化不再意味着失业和生活危机，而应当用于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和扩大人民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与自由发展的机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应转化为资本利润的增加，而应当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

劳动也将逐步改变自己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主要是维持生存的手段，是工人在资本控制下不得不进行的活动。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随着剥削关系和阶级差别逐步消失，劳动将越来越成为社会成员共同建设社会、发展自身能力的自觉活动。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在一夜之间消除旧社会留下的一切矛盾。它仍然需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影响，并防止新的特权和官僚主义产生。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保持政治觉悟，通过群众监督和社会主义民主维护自身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不把社会主义看成少数专家替人民设计的完善方案。社会主义只能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自觉斗争、组织和实践的结果。没有群众的主动参加，没有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和革命政党，社会主义就会失去自己的阶级基础。

因此，今天纪念五一，不能只停留在赞美过去工人的英勇斗争。历史纪念只有同现实行动结合起来，才具有真正意义。劳动者必须从自己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出发，建立基层组织，加强工会和群众团体，反对欠薪、超时劳动、任意解雇和危险的劳动条件。

工人还必须反对公共服务私有化、社会福利削减和生活成本上涨，维护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公共性质。这些斗争关系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直接利益，也是反对资本把一切社会领域变成利润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不能满足于局部防御。资本的进攻具有整体性，劳动者的斗争也必须形成统一的政治方向。必须把企业内的斗争同行业、地区和全国性的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要求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策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在群众中耐心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揭示各种社会问题背后的阶级关系，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认识到，个人困境不是个人失败，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只有当工人从零散的不满上升为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形成改变社会的力量。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这种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应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坚持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保持同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

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不能只在选举时期接近工人，也不能把群众当作获得议席和政治地位的工具。它必须长期扎根于群众之中，在工人的每一场正义斗争中经受考验，把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工人组织起来，并为整个阶级指出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五一国际劳动节应当成为检验各种政治力量的时刻。真正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人，不能只发表赞美劳动的讲话，而必须回答：是否支持工人组织和罢工的权利？是否反对资本压低工资和削减福利？是否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否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

一切回避这些问题的“劳动颂歌”，都可能成为掩盖阶级矛盾的工具。资本家可以在五一向工人表示感谢，政府可以举行庆祝活动，但只要工人仍然受到剥削，只要劳动成果仍然被资本占有，这些赞美就无法改变劳动者的实际地位。

真正纪念五一，就是继承国际工人运动的战斗传统，把每一项已经获得的权利都看作继续前进的基础，而不是斗争的终点。八小时工作制曾经是工人阶级的伟大要求，但今天资本仍然通过加班、零工劳动、待命制度和数字平台重新侵占劳动者的时间。因此，争取缩短劳动时间、保障就业和提高劳动者对生活的支配权，仍然是现实任务。

真正纪念五一，还意味着反对把劳动者划分为所谓“有价值”和“没有价值”的群体。无论是产业工人、服务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失业者、移民工人，还是从事家务和社会照护的劳动者，都是现代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资本主义利用不同形式的劳动，却试图让劳动者彼此分裂。

只有把这些劳动群众团结起来，形成广泛而有原则的阶级联盟，工人阶级才能承担领导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不是由口号宣布的，而是在实际斗争中，通过组织性、纪律性、政治纲领和为全体被压迫人民利益而斗争来建立的。

五月一日向我们表明，工人阶级的力量来自联合。一个工人可以被解雇，一家工厂的罢工可以被孤立，但当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的工人共同起来时，资本主义社会赖以运转的整个基础都会受到震动。

资本家拥有财富、国家机器和传播工具，工人阶级则拥有自己的数量、组织和在社会生产中的决定性地位。没有劳动者的工作，机器不会运转，商品不会流通，交通不会运行，社会生活也无法维持。正是这种客观地位，使工人阶级具备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

但是，这种力量只有通过组织和政治觉悟才能变成现实。分散的工人只是资本支配下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并认识自身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才是能够改变世界的革命力量。

因此，五一的口号绝不能只是“劳动光荣”。我们还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必须摆脱资本的奴役，劳动成果必须归劳动人民所有，社会生产必须服从人民需要，国家政权必须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手中。

五一不是劳资和谐的节日，而是劳动反对资本的战斗节日；不是资产阶级施舍福利的节日，而是工人阶级依靠自身力量争取解放的节日；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节日，而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国际主义节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立场，把争取工资、工时、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斗争，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争取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

我们要反对一切试图消解阶级斗争的改良主义幻想，反对把工人运动变成资本主义秩序附属品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利用民族、种族、宗教和国籍差别分裂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政治。

我们要加强工人的组织、教育和联合，建设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政党，使工人阶级从受剥削的自在阶级成长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独立政治力量的自为阶级。

只要资本主义剥削仍然存在，只要劳动仍然服从资本，只要帝国主义战争仍然让劳动人民付出代价，五一的战斗旗帜就不会失去意义。它将继续提醒每一个劳动者：我们所拥有的权利来自斗争，我们未来的解放同样只能依靠斗争。

让我们继承国际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把眼前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目标结合起来，把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

让五月一日重新成为工人觉醒、组织和战斗的号角，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红旗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斗争中高高飘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反对资本剥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

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纪念欧战胜利81周年

一、法西斯主义和欧洲战争的根源

八十一年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纳粹德国的统治最终崩溃。纪念这场胜利，不能只把战争解释为少数政治家的疯狂，也不能把它简单说成抽象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和阶级根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经济危机、失业和贫困不断加深，各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争夺市场、原料、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德国垄断资本不甘于原有的世界划分，企图通过重新武装和对外扩张，夺取更大的利益。

在工人运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发生危机的条件下，德国大资本扶植纳粹党，用极端民族主义、反共主义和种族主义煽动群众。纳粹政权摧毁共产党和工会，镇压工人阶级的一切独立组织，把整个社会纳入军事化和战争经济之中。法西斯主义表面上反对金融寡头和旧精英，实际上却保护垄断资本的所有权和利润。

纳粹德国发动的战争，不只是普通的国家冲突，而是带有殖民掠夺和种族灭绝性质的帝国主义战争。纳粹政权企图奴役欧洲各国人民，掠夺土地和资源，并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罗姆人、共产党人和其他被迫害者实施大规模屠杀。

因此，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偶然怪物，而是资本主义危机、垄断资本统治和帝国主义争夺发展到极端时的一种反动形式。只谴责希特勒个人，却回避扶植他的垄断资本和产生战争的帝国主义制度，就不能真正总结历史教训。

纪念欧战胜利，首先必须认清：反对法西斯主义，不能只反对它的旗帜、制服和口号，还必须反对孕育它的资本统治、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

二、苏联红军和各国人民是战胜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力量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是少数政治家在会议桌上决定的，也不是某一个国家单独完成的，而是苏联人民、各国工人阶级、共产党人、游击队员和广大反法西斯群众共同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承担了最沉重的战争压力，也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

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不只是为了击败一个军事对手，而是企图摧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掠夺苏联的土地、粮食、矿产和工业资源，并把苏联各族人民置于殖民奴役之下。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大规模进攻，苏联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各族人民迅速动员起来，把保卫祖国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

莫斯科保卫战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欧洲战争的重要转折；库尔斯克战役进一步粉碎了德军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的企图。此后，苏联红军发动连续反攻，把德国军队逐步赶出苏联国土，并向东欧和德国本土推进，最终攻克柏林，摧毁了纳粹政权的军事中心。

这场胜利不仅属于前线的红军战士，也属于后方千百万劳动人民。大量工厂被迁往东部，工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生产，为前线制造武器、车辆和生活物资。农民承担粮食供应，铁路工人维持运输，医护人员抢救伤员，妇女和青年大规模进入生产和国防岗位。正是这种全国性的社会动员，使苏联能够承受战争初期的严重损失，并不断积累反攻力量。

苏联能够完成这种动员，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有密切关系。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使国家能够集中工业、交通和物资力量服务于反法西斯战争，而不是让生产服从个别资本家的利润。战争证明，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能够发挥远远超过分散个人的力量。

欧洲各国人民也进行了英勇抵抗。在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被占领国家，共产党人、工人和进步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破坏德军交通，袭击占领机关，组织罢工，营救被迫害者。许多共产党人在本国统治阶级投降或妥协之后，仍然坚持武装斗争，成为抵抗运动的重要骨干。

英美等盟国的军队和人民同样为击败纳粹德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西线战场、空中作战、海上运输和物资援助，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必要否认这些贡献，但同样必须反对把欧战胜利歪曲成少数西方国家单独“解放欧洲”的历史。

真正完整的历史图景是：苏联战场消耗并击败了纳粹德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各国抵抗运动从内部打击法西斯占领，西方盟国从西线和其他战场发动进攻。不同力量之间虽然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目的，但在反对纳粹德国这一共同目标上形成了反法西斯同盟。

因此，欧战胜利首先是一场人民的胜利。它是无数普通士兵、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和抵抗战士用生命换来的。柏林上空升起的红旗，不仅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失败，也象征着被法西斯主义轻视和迫害的劳动人民，最终成为摧毁法西斯统治的决定性力量。

纪念欧战胜利，就必须尊重这段历史，反对淡化苏联人民和共产党人的贡献，也反对把战争胜利完全归功于将领、外交家和少数国家领导人。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组织起来、敢于牺牲并坚持斗争的人民群众。

三、欧战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但没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纳粹德国奴役欧洲、摧毁社会主义苏联和建立种族殖民帝国的计划。集中营被解放，被占领国家重新获得独立，法西斯政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遭到彻底失败。这场胜利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斗争。

战争也证明，人民群众不是只能被动承受历史灾难的对象。苏联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能够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所形成的组织力量，把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抵挡并最终击败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各国抵抗运动同样表明，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即使面对严密镇压和军事占领，也能够坚持斗争并改变战争进程。

柏林上空升起的红旗，成为反法西斯胜利的重要象征。它说明，曾经被纳粹主义宣布必须消灭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成为摧毁纳粹政权的主要力量。法西斯主义鼓吹所谓强者统治和民族优越，而历史却证明，真正决定战争结果的是劳动人民的组织、牺牲和集体力量。

但是，1945年的胜利并没有消灭产生战争的根本制度。纳粹德国虽然灭亡，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资源、投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矛盾并未消失，只是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采取了新的形式。

战争结束后，英法等国仍试图维持殖民统治，美国垄断资本则凭借战争中扩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取得更加重要的地位。原来的反法西斯同盟很快发生分裂，西方统治集团开始把社会主义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人视为新的主要敌人。部分旧法西斯官员、军人和情报人员，也被重新利用于反共政策之中。

这说明，资产阶级国家反对法西斯主义，往往具有自身的利益界限。当法西斯扩张威胁到它们的国家利益时，它们可以同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当共同敌人被击败后，它们又会恢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敌视。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不能由此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阶级性质。

欧战胜利还经常遭到资产阶级历史叙述的歪曲。一些人把胜利简单解释为抽象的“自由战胜专制”，却不谈垄断资本对法西斯主义的扶植，不谈苏联人民承担的巨大牺牲，也不谈共产党人在欧洲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这样一种叙述，把战争的阶级内容和社会根源从历史中抹去了。

另一种歪曲，则是把纳粹德国同社会主义苏联不加区别地并列起来，抹杀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种族灭绝战争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之间的根本差别。对苏联历史中的错误和问题可以进行具体分析，但不能因此否定苏联人民在击败纳粹德国中的决定性贡献。

同时，捍卫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也不意味着支持今天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苏联符号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苏联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性质。不能因为某个国家使用红旗、纪念卫国战争，便把它现实中的军事和外交政策自动说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既反对否定苏联和共产党人历史贡献的反共主义，也反对把反法西斯传统变成现实大国沙文主义的装饰。判断一场战争或一种国家政策，必须分析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不能只看它使用什么历史口号和象征。

欧战胜利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可以被人民的联合斗争击败；但它也提醒我们，只要垄断资本的统治仍然存在，只要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争夺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新的战争、军国主义和极端反动政治就仍有产生的条件。

因此，纪念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能把1945年当作历史的终点。那场胜利完成了摧毁纳粹政权的伟大任务，却没有完成消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反法西斯斗争只有进一步发展为反对垄断资本、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才能真正继承反法西斯人民的历史事业。

四、捍卫反法西斯历史，为和平、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纪念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一周年，不是为了把历史变成庆典和仪式，而是为了从胜利与牺牲中汲取现实教训。法西斯主义虽然在欧洲战场上遭到失败，但产生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垄断资本统治、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争夺并没有因此自动消失。

我们必须反对一切歪曲和美化法西斯主义的企图。任何淡化纳粹侵略、否认种族灭绝、为法西斯合作者翻案的行为，都是对死难者和反法西斯战士的侮辱。与此同时，也必须反对抹杀苏联人民、共产党人和各国抵抗力量历史贡献的反共主义叙述。

捍卫历史真相，不等于把历史冻结为民族主义神话。任何国家都不能仅仅因为使用反法西斯符号，就把自己的现实扩军、战争和强权政策说成正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判断战争和国家政策，必须分析其阶级基础、政治目的和所服务的社会利益。

今天，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仍然会利用经济危机和社会不满，煽动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仇恨。他们把失业、贫困和公共服务恶化归咎于移民、少数民族和外国劳动者，以此转移群众对资本剥削和财富集中的愤怒。这种政治正是法西斯主义重新生长的重要土壤。

工人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一切分裂劳动人民的思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肤色的工人，不应被驱赶着为资本家的市场、利润和势力范围彼此仇杀。各国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在于反对战争、剥削和压迫，而不是维护本国垄断资本的扩张要求。

真正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的口号往往由统治阶级提出，战争的利润却被军火资本、金融资本和垄断企业占有；死亡、伤残、通货膨胀、税收和福利削减，则由工人和普通群众承担。无产阶级不能成为资产阶级争夺世界的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同时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把自己的扩张包装成解放。只有坚持独立的阶级立场，才能分清真正的人民战争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争霸战争。

反法西斯斗争也不能停留在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范围内。资产阶级民主在正常时期允许有限的政治权利，但当资本统治遭遇严重危机时，统治阶级仍然可能削弱民主、镇压工人运动，并依靠极端反动势力维护秩序。只有强大的、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成为反法西斯斗争最可靠的力量。

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加强工会、群众团体和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工作，把反对法西斯主义同争取工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斗争结合起来。只有解决劳动群众的实际困难，揭露这些困难的资本主义根源，才能阻止右翼势力利用群众的不满。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工人阶级应当联合一切愿意反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侵略战争的力量，保卫群众的民主权利。但无产阶级在联合行动中必须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不能把领导权交给那些在危机时可能再次同反动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集团。

欧战胜利证明，人民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就能够击败看似不可战胜的反动力量。但历史也证明，任何胜利都不会自动永久保存。如果劳动人民失去组织，如果工人阶级放弃独立政治，反动势力就可能利用新的危机重新抬头。

我们纪念柏林的解放，纪念集中营大门被打开，纪念那些倒在战场、刑场和地下斗争中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普通群众，不是为了停留在悲壮的回忆中，而是为了继续他们反对奴役和压迫的事业。

这项事业只有同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彻底的意义。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统治在危机条件下的一种极端形式，而社会主义则要求消灭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结束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使社会生产真正服务于人民需要。

只有工人阶级取得政治权力，剥夺垄断资本，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失业、贫困、民族仇恨和帝国主义战争不断产生的经济基础。持久和平不能建立在资本竞争和军备竞赛之上，只能建立在各国劳动人民平等合作的基础之上。

八十一年前，苏联红军和世界各国反法西斯人民用鲜血摧毁了纳粹德国。今天，纪念这场胜利，就是要捍卫历史真相，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共主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坚持各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团结。

柏林上空的红旗属于历史，但它所象征的人民力量、国际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理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制造危机和战争，只要反动势力仍然企图用仇恨分裂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就没有结束。

让我们继承反法西斯战士的遗志，把对历史的纪念转化为现实的斗争，把反对法西斯主义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把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结合起来。

永远铭记为反法西斯胜利牺牲的人民！

反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维护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

为社会主义和持久和平而斗争！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论天硕幼儿园罢工

一、教师集体罢工揭开了幼儿园经营危机

2026年5月6日，山西吕梁离石区天硕幼儿园教师因工资长期遭到拖欠而集体停工。据家长反映，该幼儿园每名学生每年学费约两万元，但园方不仅无力发放教师工资，甚至已经缺少购买学生餐食所需食品的资金。一边是家长已经缴纳的高额学费，一边是教师付出了实际劳动，然而幼儿园却连最基本的工资和餐食开支都无法维持。这一矛盾不能简单地用“经营困难”四个字搪塞过去。

幼儿园的正常运转，首先依靠教师、保育员、厨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劳动。教师每天承担教学、照护、安全管理以及与家长沟通等大量工作，幼儿园所出售的所谓“教育服务”，归根到底正是由这些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没有教师的劳动，再昂贵的装修、再响亮的品牌、再精心设计的招生宣传，都不可能变成真正的教育。

然而，在私人经营制度下，真正掌握学费、账目和经营决策的并不是教师，也不是家长，而是幼儿园的举办者和管理者。家长负责交费，教师负责劳动，但他们却无权决定资金怎样使用，也无法了解学费究竟被用于工资、食品、房租、偿债，还是被挪作其他用途。经营者控制收入和账目，却把经营失败的后果转嫁给不掌握经营权的劳动者和家长。

这正是事件中最值得追问的问题：既然家长已经支付学费，教师也已经完成劳动，那么钱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盈利时，经营者可以占有收益；出现债务和亏损时，却首先停止支付教师工资，压缩儿童餐食和日常开支？为什么承担劳动和缴纳费用的人没有决策权，而掌握决策权的人却可以把风险推给别人？

资本经营者往往把欠薪说成暂时的“资金周转困难”，要求教师继续坚持工作，等待经营状况好转。但教师并不是幼儿园的无偿投资人，也不是经营者的债权担保人。她们没有参与决定幼儿园的扩张、借债、收费和资金安排，却被要求承担这些决策失败的后果。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把经营风险强加给劳动者。

更为严重的是，当幼儿园已经无力购买儿童餐食时，问题便不再只是劳资纠纷，而是说明整个机构已经陷入严重的经营和安全危机。如果连食品供应都无法保障，那么教学人员配置、卫生、消防、设备维修和儿童照护是否也在被削减？所谓“继续正常办学”，很可能只是把危机隐藏起来，依靠教师的无偿劳动和家长的继续缴费勉强维持表面秩序。

教师的集体停工打破了这种虚假秩序。过去，园方可以分别拖欠每一名教师的工资，使劳动者陷入孤立状态；教师一旦联合起来停止劳动，幼儿园便立即无法正常运转。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真正支撑教育机构的不是经营者手中的营业执照和收费权，而是广大教师和工作人员每天付出的劳动。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经常把此类事件描述为个别企业管理失败，企图把制度问题缩小成园长个人的道德或能力问题。当然，具体经营者必须为欠薪和资金危机承担责任，但仅仅更换一个园长，并不能消除这种矛盾。只要教育仍被作为商品出售，只要私人举办者掌握资金和经营权，只要教师仍然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经营危机就始终可能被转嫁给劳动者。

天硕幼儿园的教师罢工，使原本被封闭在账本和办公室中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它迫使人们看到，幼儿园并不是由经营者的“投资”和“管理”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教师劳动、家长缴费和儿童需要共同支撑的社会事业。当这项社会事业被私人资本控制时，教育的目的就可能从保障儿童成长，转变为维持收费、偿还债务和追求经营收益。

因此，这场罢工绝不是教师“不负责任”或“不顾孩子”，恰恰相反，真正不负责任的是那些在已经无力支付工资和保障餐食的情况下，仍然隐瞒经营危机、继续维持收费和招生的管理者。教师通过集体行动，把儿童和家长面临的潜在风险公开出来，也使劳动者遭受的侵害不再被当作可以私下拖延的小问题。

天硕幼儿园事件所揭示的，是一种清楚的阶级关系：教师创造教育服务，家长支付费用，经营者却掌握收入、账目和决策权；当经营顺利时，收益由私人占有，当经营失败时，损失却被转嫁给劳动者和普通家庭。正是这种权利与责任的分离，构成了民办教育资本化的根本矛盾。

教师的集体罢工只是揭开了问题的第一层。接下来必须进一步说明，拖欠工资并不是普通的债务纠纷，而是经营者对劳动者已经付出的劳动和应得报酬的直接侵占。

二、欠薪不是普通债务，而是对工人劳动成果的侵占

天硕幼儿园拖欠教师工资，不能被轻描淡写地解释为普通的经济纠纷。工资不是经营者有钱时才发放的补贴，也不是对教师“表现良好”的奖励，而是教师出卖劳动力、完成教学和照护工作后依法应得的报酬。教师已经付出了劳动，园方却拒绝支付工资，实质上就是无偿占有她们已经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

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为了维持本人和家庭的生活，不得不把劳动力出卖给生产资料和经营条件的占有者。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为了在劳动过程中取得比工资更多的价值。即使工资能够按时支付，资本家也仍然依靠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获得利润；而欠薪则更进一步，连劳动力本身应得的价格都被拖欠或扣留。

幼儿园经营者可能声称，机构当前没有现金，等到招生、收费或资金周转恢复以后再补发工资。但这种说法颠倒了责任关系。教师不是幼儿园的股东，也没有参与决定收费标准、借债规模、投资方向和资金用途。既然她们无权分享经营利润和决定经营政策，就没有义务承担经营失败造成的损失。

资本经营的基本逻辑向来是：盈利归私人所有，风险却尽量转嫁给劳动者。经营顺利时，教师只能领取固定工资，不能因为幼儿园利润增加而自动分享收益；经营出现危机时，园方却要求教师接受延期发薪、减少工资甚至继续无偿工作。所谓“共渡难关”，实际上只是要求工人为资本的错误决策买单。

园方已经接受教师提供的劳动，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工资支付义务。经营者不能像拖欠普通商业款项那样随意拖延工资，因为工资关系到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教师需要用工资支付房租、食品、交通、医疗和家庭开支。一旦工资被拖欠，经营危机就会立即转化为劳动者的生活危机。

这也说明，资本主义法律形式上的所谓平等，并不能掩盖雇佣关系中的实际不平等。园方掌握收费、账户、合同和管理权，可以决定是否继续招生、是否借债以及优先支付哪些费用；教师却只能通过工资维持生活。在这种条件下，所谓双方“自愿协商”，往往只是经营者利用劳动者的生存压力迫使其继续工作。

欠薪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掠夺性质。教师在正常发薪之前，实际上已经先向园方提供了劳动。也就是说，劳动者不是先拿钱再劳动，而是先工作数周甚至数月，之后才领取工资。工资一旦被拖欠，就等于劳动者在没有利息、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强迫向经营者提供了一笔以自身劳动为内容的贷款。

而经营者往往一边拖欠工资，一边要求教师继续上班，维持招生、教学和家长关系。这就意味着，旧的劳动报酬尚未支付，新的劳动债务又在不断增加。教师工作的时间越长，被拖欠的金额越大，园方对其生活的控制反而越强，因为许多教师担心一旦离职，过去的工资将更加难以追回。

资本还经常利用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质进行道德绑架。园方可能以“不能耽误孩子”“教师应当有责任心”“家长会受到影响”为理由，要求教师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但儿童教育和安全首先应由收取学费、掌握经营权的园方负责，不能把经营者的责任转嫁给已经遭受欠薪的教师。

教师关心儿童，并不意味着她们必须无偿劳动。恰恰相反，稳定发放工资、保障人员配置和劳动条件，本身就是维护儿童利益的必要前提。一个依靠拖欠工资才能维持的幼儿园，不可能长期提供安全、稳定和有质量的教育。

一些人可能认为，幼儿园已经没有资金，教师即使罢工也“变不出钱来”。但罢工的意义不仅在于立即取得现金，更在于阻止园方继续隐瞒危机、继续积累新的工资债务，并迫使经营者、监管部门和家长公开面对问题。如果教师继续沉默工作，经营者就可以继续招生和收费，把更大的风险留给教师和家庭。

因此，教师集体停工不是对教育秩序的破坏，而是对无偿劳动的拒绝。真正破坏教育秩序的，是经营者在无力保障工资和基本餐食的情况下仍然维持私人控制，并把机构正常运转的责任压在教师身上。

从阶级关系上看，欠薪暴露了资本所有权的本质。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拖欠工资，不是因为其劳动比教师更多，而是因为他占有幼儿园的经营权、账户和收入分配权。教师虽然创造了教育服务，却不能直接支配自己劳动形成的收入。这种劳动创造与收入控制相分离，正是资本支配劳动的具体表现。

在真正由劳动人民掌握的教育制度中，教师工资和儿童基本需要应当优先于经营利润、债务扩张和投资回报。教育机构的收入与支出也不应成为少数经营者的秘密，而应接受教师、家长和公共部门的共同监督。

因此，对天硕幼儿园欠薪事件的处理，不能只停留在要求园方作出一个补发日期。必须查清学费收入和资金流向，优先清偿教师工资和社会保险，追究经营者的责任，并保障参加集体行动的教师不受解雇和报复。

教师要求补发工资，不是在向经营者索取恩惠，而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支持教师的集体行动，就是反对资本把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就是维护劳动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组织权利。

三、高额学费与教师欠薪并存，暴露私人经营制度的根本矛盾

天硕幼儿园事件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家长已经支付了每年约两万元的学费，教师也已经完成了教学和照护劳动，园方却仍然无力支付工资，甚至连儿童餐食所需的食品都难以购买。收入、劳动和教育需求都真实存在，幼儿园却陷入停顿，这说明问题绝不是简单的“没有人付钱”，而是资金支配权与实际承担责任的人发生了彻底分离。

家长缴纳的学费，表面上是购买幼儿教育服务，实际上要通过教师、保育员、厨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共同劳动，才能转化为儿童每天接受的教学、照护和餐食。没有这些劳动者，学费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教育内容。然而，劳动者虽然直接创造教育服务，却没有权利决定学费如何分配，也无法监督园方是否优先支付工资和保障儿童的基本需要。

私人举办者掌握着账户、账目、收费权和经营决策权。是否扩张规模、是否举债、是否进行其他投资、资金先偿还什么债务，都由经营者决定。教师和家长既没有参与这些决策，也不能检查完整账目，却要在资金链断裂后承担最直接的损失：教师收不到工资，家长可能无法退回学费，儿童则面临停课、餐食减少和照护中断。

这种制度充分体现了私人所有制下权利与责任的不平等。经营顺利时，经营者以所有者身份占有经营收益，把利润视为自己投资和管理所得；经营失败时，却把教师工资、家长预付款和儿童待遇当作可以暂缓支付或随意削减的项目。利润被私人占有，亏损却被社会化，由劳动者和普通家庭共同承担。

幼儿教育本身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质。它不仅关系到儿童成长，也关系到劳动者家庭能否正常工作和生活。每一所幼儿园的运行，都依靠教师集体劳动、家庭缴费、食品供应、公共监管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共同支持。但是在私人经营制度下，这种高度社会化的教育活动，却被置于少数经营者的私人控制之下。

这就形成了社会化劳动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幼儿园不是经营者一个人办起来的，也不是资本投入后便能自动运转。它依靠许多劳动者长期合作，依靠家庭持续支付费用，却由私人举办者独占经营权和信息权。广大参与者共同创造和维持教育活动，却不能共同决定教育机构的命运。

当教育机构正常运行时，这种矛盾常常被招生宣传和表面的教学秩序掩盖。家长看到的是教室、课程和活动，教师面对的是每天具体的教学任务，而资金究竟如何使用，则被封闭在经营者的内部账目之中。只有当工资停止发放、食品供应出现问题时，私人控制的真实后果才突然暴露出来。

园方可能把财务状况称为“商业秘密”，但学费来自普通家庭，收入主要依靠教师劳动实现，机构承担的又是儿童教育和安全责任，因此其财务状况绝不能被当作经营者个人的私事。一个连基本工资和餐食都无法保障的幼儿园，没有理由继续隐瞒债务和资金流向，更没有权利在家长和教师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收取费用。

资产阶级经济学往往把这种危机解释为市场中的优胜劣汰，认为经营不善的机构自然应当退出市场。但幼儿园并不是普通商品商店。它一旦突然停办，受到伤害的不是抽象的市场主体，而是依靠工资生活的教师、已经预付学费的家庭和需要连续照护的儿童。所谓市场退出，实际上意味着经营者的失败被转化为广大劳动群众的现实灾难。

即便经营者最终破产，私人所有制也往往把银行、房东和其他商业债权人的要求置于重要位置，而教师工资和家长学费能否追回却充满不确定性。劳动者和家庭承担了机构运行所必需的劳动与费用，却在财产分配和债务清偿中缺少决定权，这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法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高于对劳动和社会需要的保护。

修正主义者把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说成“调动社会力量”，把教育市场化说成“增加群众选择”。但所谓选择，往往只是让家长在不同收费机构之间选择，让教师在不同私人雇主之间寻找工作，并没有赋予他们监督经营、决定资金用途和管理教育事业的权利。私人机构数量增加，并不等于劳动人民真正掌握了教育。

相反，国家和公共部门一旦把幼儿教育责任交给私人举办者，经营风险便会被隐藏在一个个独立机构内部。收费时，园方以市场主体身份自由经营；危机发生时，又要求政府、家长和教师共同“维持稳定”。这实际上是私人资本享有经营权，劳动人民承担社会责任。

因此，解决天硕幼儿园事件，不能只是寻找新的投资者接手，更不能允许经营者换一个名称继续办学。必须公开全部财务账目，查清学费收入、债务和资金用途，优先保障教师工资、家长权益和儿童基本生活，并追究原经营者造成危机的责任。

更根本地说，幼儿教育不能继续作为私人资本追求收益的经营项目。凡是关系到儿童成长和劳动人民基本生活的教育机构，都应当逐步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由社会承担经费，由教师和家长参与监督，使收费、支出和管理接受公开检查。

天硕幼儿园的危机证明，私人资本并没有因为进入教育领域就改变自身性质。只要经营目的仍然服从资金周转、债务偿还和私人收益，教师的劳动权利和儿童的教育需要就随时可能被牺牲。教育事业只有摆脱私人占有和秘密经营，才能真正服从劳动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教育商品化把教师、家长和儿童同时置于资本支配之下

天硕幼儿园欠薪事件说明，一旦教育被作为商品经营，教师、家长和儿童就都会被卷入资本增殖的逻辑。幼儿园不再首先被看作满足儿童成长需要的公共事业，而被当成可以收费、扩张、投资和获取收益的经营项目。教育质量、教师待遇和儿童生活条件，也就越来越服从成本、现金流和利润的计算。

在这种制度下，教师首先被降格为普通的用工成本。经营者关心的不是教师能否长期稳定地从事教育工作，而是如何用更低的工资维持更多班级，如何减少人员配置，如何延长工作时间，并把教学、照护、招生和家长沟通等多项任务集中到少数劳动者身上。

幼儿教师的劳动具有高度复杂性。她们不仅承担知识启蒙，还要负责儿童安全、饮食、卫生、情绪安抚和日常照料。这种劳动要求长期投入体力、耐心和责任心，却常常被资本经营者说成普通的“服务工作”，以此压低工资和削弱劳动保障。

当机构出现资金困难时，教师工资往往成为最先被拖欠的项目。因为经营者认为，教师担心失业、担心工资无法追回，也顾虑儿童和家长，因而更容易被迫继续工作。这种对职业责任感的利用，实际上是资本对教育劳动者进行额外剥削的手段。

家长同样没有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人。在市场化宣传中，家长似乎拥有选择权，可以选择不同收费、不同课程和不同品牌的幼儿园。但这种选择只是购买商品的选择，而不是参与管理和监督教育事业的权利。

家长支付学费后，通常无法了解幼儿园的真实财务状况，也无权决定收入是否优先用于教师工资、儿童餐食和设施安全。即使每年缴纳两万元，家长仍然只能被动接受园方提供的信息。一旦机构资金链断裂，他们可能同时失去学费和儿童照护服务。

资本经营者经常用装修、课程名称、外语教学和品牌包装制造所谓“高端教育”的形象，把家庭之间对教育机会的焦虑转化为收费来源。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在竞争中落后，被迫承担越来越高的教育支出，而真正用于教师工资和儿童基本照护的资金却可能受到压缩。

教育商品化还使儿童本身被转化为收费对象。儿童的数量意味着学费收入，班级规模意味着利润空间，课程和活动也可以被包装成附加收费项目。儿童不再首先被看作需要社会共同照护和发展的成员，而被计算为每个学期能够带来多少收入的“生源”。

在利润驱动下，经营者可能尽量扩大班额、减少教师、降低餐食成本、推迟设备维修，从而提高经营收益。即使没有发生公开事故，这种成本压缩也会不断损害教育质量和儿童安全。资本节省下来的每一笔开支，都可能意味着教师承担更多劳动，儿童得到更少照护。

天硕幼儿园已经无力购买餐食所需食品，正是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儿童家庭已经缴费，儿童每天需要吃饭，但食品供应仍然可能中断。这说明，在私人经营制度下，儿童最基本的需要也不能自动获得优先保障。

资产阶级常常宣称，市场竞争能够迫使教育机构提高质量。但在现实中，家长难以获得完整信息，幼儿又无法自己评价服务。园方可以通过广告和包装吸引生源，却把欠薪、债务和安全隐患隐藏起来。所谓市场选择，往往发生在信息极不平等的条件下。

即使某家幼儿园因为经营失败退出市场，也不能证明市场机制有效。它留下的欠薪、退费、失学和儿童安置问题，最终仍然需要教师、家长和公共部门解决。经营者享受了经营自由，社会却要承担经营失败的后果。

修正主义路线把这种教育资本化说成发展多种办学形式，仿佛只要私人机构数量增加，教育资源就会更加丰富。但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交给私人资本，把劳动人民的教育需求变成市场需求。

当公办幼儿教育供给不足时，家庭不得不进入民办市场。资本正是利用这种现实需要收取高额费用。家长不是因为崇拜私人经营，而是因为公共服务不足而被迫购买商品化教育。

修正主义者一方面保留社会主义和人民教育的口号，另一方面允许教育资源按照支付能力分配。收入较高的家庭可以购买更昂贵的教育服务，收入较低的家庭则被限制在更少的选择中。教育由社会权利逐渐变成家庭经济能力的证明。

这与社会主义教育原则根本对立。社会主义教育应当由社会保障，使每一个儿童不因家庭收入、地区和父母职业而受到歧视。教师应当成为受到社会尊重和稳定保障的劳动者，而不是在私人老板手下随时可能被欠薪和解雇的雇员。

反修正主义的批判必须指出，教育商品化并不是某些政策执行不当，而是资本主义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扩张。只要承认资本有权把教育当作投资领域，利润规律就必然进入教学、用工、收费和儿童照护的每一个环节。

因此，不能只要求私人幼儿园“提高责任心”，而必须限制和取消逐利资本对幼儿教育的控制。幼儿教育经费应当主要由公共财政承担，教师工资应当获得稳定保障，机构收支必须公开透明，教师和家长应当参与监督和管理。

对于已经出现严重欠薪和安全风险的民办机构，公共部门不能只进行调解，而应当立即介入，保障教师工资、儿童餐食和家长退费。在经营者无力继续办学时，应由公办教育体系接管，而不是继续寻找新的私人资本接盘。

天硕幼儿园事件表明，教师、家长和儿童虽然处于不同位置，却受到同一种资本关系的支配。教师被拖欠工资，家长承担高额费用，儿童的餐食和教育受到威胁，而经营者始终掌握最关键的资金和决策权。

因此，教师和家长不应被经营者分裂。家长不能把停课责任归咎于教师，教师也应当向家长公开说明罢工原因。双方应当共同要求查账、补发工资、保障餐食、退还费用，并追究经营者责任。

只有把教师的劳动权利、家长的监督权和儿童的教育权统一起来，才能揭露教育资本化的全部危害。教育不是可以买卖的普通商品，儿童不是生源数字，教师也不是可以被随意拖欠工资的成本项目。

反对教育商品化，就是反对资本把社会最基本的需要变成牟利工具；维护教师罢工，就是维护劳动者拒绝无偿劳动的权利；要求公共教育，就是要求社会资源首先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服务于私人利润。

论江西樟树事件

一、劳动节倒在车间：“自愿上班”掩盖不了资本的责任

2026年5月3日，一名61岁工人在“五一”假期进入公司车间劳动，参与搬运材料后突然倒地，最终抢救无效身亡。据家属反映，他长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个月只能休息极少几天。然而事故发生后，涉事公司首先强调，他在假期上班是“自愿”的。

这一说法看似是在说明当天没有强制排班，实际上却刻意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这名工人为什么要进入公司的车间打卡？为什么要按照企业的生产安排搬运材料、使用设备？为什么公司在他活着时接受他的劳动，却在他倒下以后把这一劳动说成个人行为？

如果他真的只是凭个人兴趣进入车间，那么企业为什么允许他打卡、参加生产并使用工作场所？既然他的劳动被纳入企业的生产过程，企业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那么这就不是劳动者的私人活动，而是发生在用人单位管理和控制范围内的劳动。

所谓“自愿上班”，还掩盖了长期超时劳动的背景。一个61岁的工人，如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月只能休息两三天，就不能把五一当天单独切割出来，仿佛这只是一次偶然的个人选择。必须追问，他是否长期处在低工资、生活压力、排班制度和失业风险的共同强迫之下。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表面上建立在自由合同之上，工人似乎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上班。但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售劳动力取得生活资料。公司掌握岗位、工资、奖金、排班和续聘权，工人所谓的“选择”，往往是在失去收入与继续忍受超时劳动之间进行选择。

资本正是利用这种生存压力，制造出所谓“自愿加班”。企业可以通过压低基本工资、设置全勤奖、计件工资和绩效考核，使劳动者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才能维持基本收入；一旦出现工伤、疾病和死亡，又把劳动者在这种条件下作出的选择解释成完全出于个人意愿。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名工人倒下的时间正值“五一”劳动节。五月一日原本是国际工人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反对资本无限延长劳动日的斗争纪念日；但在所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一名年过六旬的劳动者却仍要在节日期间长时间工作，并最终倒在生产线上。

这不是对“劳动光荣”的赞歌，而是对超时劳动制度的控诉。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这名工人为什么愿意在五一上班，而是为什么他到了61岁，仍然需要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换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为什么企业可以长期使用他的劳动力，却没有保障他的休息、健康和生命安全。

因此，这场死亡不能被缩小为个人突发疾病，也不能被一句“自愿上班”轻轻带过。必须查清企业的长期工时制度、排班记录、加班工资和职业健康保障，查清所谓自愿背后究竟存在怎样的经济压力和管理控制。

劳动成果归企业所有，劳动风险却被推给个人；工人健康时，他的劳动属于公司，工人倒下后，他的死亡却被说成个人选择。这正是资本主义用工关系最赤裸的逻辑，也是这起事件首先需要揭露的谎言。

二、“自愿加班”是雇佣劳动关系制造出来的强迫

涉事公司把工人在“五一”假期上班解释为个人自愿，仿佛劳动者和企业是在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压力的条件下作出选择。但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合同和口头同意的表面形式上，而必须考察工人作出所谓选择时所处的现实经济条件。

资本家掌握厂房、机器、原料和工作岗位，工人则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售劳动力取得工资。法律上，工人似乎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工作；但在现实中，不工作就意味着失去收入，甚至无法负担食品、住房、医疗和家庭开支。这种自由，本质上是在接受资本条件和陷入生活困难之间作出选择的自由。

因此，判断加班是否真正自愿，不能只看工人有没有在申请表上签字，也不能只看企业有没有公开发出强制命令。只要工资水平、排班制度、奖金办法和就业压力迫使工人必须延长劳动时间，所谓自愿就只是经济强迫的法律包装。

企业可以把基本工资压得很低，再把劳动者维持生活所需的一部分收入放进加班费、计件工资、全勤奖和绩效奖金中。工人表面上可以拒绝加班，但拒绝以后，收入可能大幅下降，也可能失去奖金、被安排到更差的岗位，甚至面临不再续用的威胁。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同意”并不能证明双方真正平等。

对一名61岁的工人来说，这种压力尤其明显。到了这个年龄，他在劳动力市场上重新寻找工作的机会往往更加有限。即使身体已经难以承受长时间劳动，也可能因为家庭支出、养老保障不足或害怕失去现有收入而继续坚持。资本正是利用劳动者对失业和贫困的恐惧，使他们“主动”接受本来不应承受的劳动条件。

所谓自愿，往往还建立在企业控制生产秩序的基础上。企业决定几点开工、生产任务多少、需要多少人、工资怎样计算。工人并不能自由决定生产速度和劳动时长。即使企业没有直接说“不加班就解雇”，只要日常任务在正常工时内根本无法完成，或者所有工人都被默认为必须留下，加班就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强制。

资本家经常把这种强制隐蔽在个人选择之中。它不公开命令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是设计一套制度，使不加班的人难以获得足够收入、难以完成指标、难以继续留在企业。随后，当劳动者因长期过劳出现疾病或死亡时，企业又拿出“自愿申请”切断自身责任。

这是一种典型的责任倒置。工作安排、生产任务和利润分配都由企业掌握，劳动者却要为在这种制度下作出的选择独自负责。企业享受了延长工时带来的产量和利润，却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健康损害和生命风险。

资产阶级常常声称，工人愿意加班是因为想要获得更多收入，因此企业只是满足劳动者的需要。但这恰恰说明正常工资不足以维持工人的生活。如果工人必须依靠每天多劳动数小时才能获得基本收入，那么问题就不是工人“希望多挣钱”，而是资本通过低工资迫使他们出卖更多生命时间。

加班工资也不能自动证明不存在剥削。工人延长劳动时间后，即使获得一定补偿，仍然可能为资本创造比加班费高得多的价值。资本家愿意支付加班费，正是因为延长劳动日能够带来更多剩余价值。何况现实中，许多企业并未依法足额支付加班工资，而是用固定工资、补贴和模糊考勤掩盖实际工时。

工人的生命时间不是可以无限出售的普通商品。劳动力的使用会消耗人的身体和精神。长期缺少休息，不仅意味着疲劳增加，也意味着工人失去了陪伴家庭、恢复健康和发展自身能力的时间。资本延长的并不只是工作日，而是对劳动者整个生命的占有。

马克思主义从不把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误认为真正自由。真正的自由，必须建立在劳动者不再受到失业和贫困威胁的基础上，必须使工人有能力拒绝危害健康的劳动条件，而不必担心因此失去生活来源。

在这起事件中，如果企业坚持说工人是自愿上班，就必须公开说明：他的正常工资是否足以维持生活？拒绝加班是否会影响工资、奖金和续聘？企业是否长期默许或鼓励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其他工人是否同样面临类似工时？没有这些调查，所谓自愿只是一句逃避责任的空话。

反修正主义的立场还要求指出，在名义上宣称劳动者是国家主人的制度下，企业却能够利用市场竞争和生活压力迫使工人长期超时劳动，这已经说明劳动者并未真正掌握生产和劳动时间的决定权。工人的权利停留在法律条文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却存在于每天的生产过程中。

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把经济强迫说成个人选择，更不能允许企业依靠一纸“自愿加班”声明逃避责任。只要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只要其生活依赖工资，只要企业控制岗位和收入，所谓自愿就必须接受严格的阶级分析。

这名工人的遭遇告诉我们，资本并不总是通过公开命令强迫劳动者。它更经常通过低工资、失业压力和管理制度，让工人自己走进车间、延长工时，然后再把这种被迫服从说成自由意愿。揭穿这种虚假的自愿，正是追究企业责任和反对超时劳动制度的前提。

三、延长劳动日，是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最直接的手段

资本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让工人单纯维持自身生活，而是为了在劳动过程中取得超过工资价值的剩余劳动。工人在一个工作日中，一部分时间生产相当于自身工资的价值，另一部分时间则无偿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总是企图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并尽可能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延长劳动日，是资本增加剩余价值最直接的办法。假如工人维持自身劳动力所需的价值，在一天中的一定劳动时间内已经生产出来，那么此后继续工作的时间，便主要成为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工作日越长，资本能够占有的剩余劳动一般也就越多。

因此，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仅休息极少天数，绝不能被说成普通的“勤劳”。这意味着资本不仅支配工人在正常工时内的劳动，而且不断侵占其本应用于休息、恢复健康、照顾家庭和发展自身的时间。被延长的不是抽象的时间，而是工人有限的生命。

资本家当然不会公开承认，延长工时是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企业通常把加班解释为生产任务紧张、订单增加、员工希望多挣钱，或者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但无论使用什么说法，只要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所创造的新增价值高于企业支付的新增工资，资本就能从中获得更多利润。

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即使支付部分加班费，仍然可能热衷于延长工时。加班费不是资本的慈善，而是购买额外劳动力使用时间的费用。只要资本认为延长生产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给工人的补偿，它就会不断要求工人继续工作。

在现实中，情况往往更加恶劣。许多企业通过固定月薪、计件工资、绩效奖金、综合工时或所谓“自愿申请”，掩盖实际发生的超时劳动。工人虽然每天在车间劳动十几个小时，工资单上却未必清楚列出全部加班时间和相应报酬。资本不仅延长劳动日，还可能直接扣留本应支付的加班工资。

对这名61岁工人而言，长期超时劳动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强度增加，更是劳动力恢复条件遭到破坏。劳动力并不是一台可以无限运转的机器。工人每天都需要通过睡眠、饮食和休息恢复身体。如果资本长期压缩这些时间，便是在加速消耗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

资本只关心劳动力今天能否投入生产，却不会自动关心这种使用是否会使工人在几年后失去劳动能力。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只要工人在当前仍能创造利润，它就有动力尽可能充分地使用这一劳动力；至于劳动者因长期疲劳患病、衰老或死亡，资本则力图把它解释为个人身体问题。

这正是雇佣劳动制度的残酷之处。工人的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但资本只把它分割成能够出售的工作小时。工人需要健康地生活几十年，资本却只计算每一班能够生产多少产品、创造多少收益。人的生命质量，在资本账簿上被压缩成劳动成本和生产效率。

61岁的劳动者本应获得更加充分的休息和保障，却仍然长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说明资本对剩余劳动的追求不会因为工人的年龄而自行停止。只要劳动者仍能进入车间，只要其劳动仍然能够带来价值，资本就会继续使用他的劳动力。

企业把这种情况称为“劳动者自己愿意多干”，实际上是在掩盖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动力。并不是资本被动接受了工人的劳动热情，而是低工资、排班制度和利润要求共同制造了超时劳动。工人需要更多收入，企业需要更多剩余劳动，双方看似都接受加班，但真正掌握决定权和主要收益的仍然是资本。

资产阶级喜欢把超时劳动解释为个人奋斗，仿佛工人多工作几个小时，就能通过努力改善命运。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劳动得越久，并不等于他能够占有更多劳动成果。新增产品和价值主要归企业支配，工人只得到其中一部分工资，而自己的身体消耗却必须全部承担。

这种制度还造成恶性竞争。一个工人接受每天十二小时劳动，企业便可能把这种工时变成普遍标准；其他工人为了保住工作，也被迫接受同样条件。单个工人所谓的自愿，最终成为压迫整个工人群体的工具。

因此，八小时工作制从来不是一个任意规定的数字，而是工人阶级限制资本侵占生命时间的重要成果。它划定了一条界限：资本购买劳动力，并不等于购买劳动者整个生命。休息权、节假日和工时限制，都是工人通过长期斗争从资本手中争得的。

然而，在修正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恢复的条件下，八小时工作制常常只保留在法律条文和节日宣传中。现实生产却以竞争、效益和发展为名，重新把工人推向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更长的劳动日。法律承认劳动者有休息权，资本却通过工资和就业压力使这种权利无法实现。

这名工人在“五一”假期倒在车间，正是对这种现实最尖锐的揭露。工人阶级曾经通过五一斗争要求缩短劳动日，而今天，资本却在劳动节继续占有一名六旬工人的生命时间，直到他的身体再也无法继续运转。

因此，调查这起死亡不能只问当天发生了什么，还必须查清长期工时。企业是否长期安排或默许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工人每月究竟休息多少天？加班费是否足额支付？管理者是否知道这种劳动状态对高龄工人的健康风险？

即使最终无法用医学方法证明某一次加班是死亡的唯一原因，也不能否认长期超时劳动本身就是对劳动权利的侵犯。资本不能要求家属证明每一分钟劳动如何直接导致死亡，才承认自己在工时制度上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看到，劳动日的长度始终是工人与资本之间力量斗争的结果。资本要求尽可能延长劳动日，工人则必须捍卫自己的健康、休息和生命。所谓合理工时，不是企业根据利润需要主动制定的，而只能依靠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加以维护。

反对超时劳动，不是反对劳动本身，而是反对资本无限占有工人的生命。真正尊重劳动，就必须使生产服从人的需要，而不是使人的身体服从资本增殖。一个社会如果只能依靠工人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维持利润，那么需要受到批判的不是工人不够勤奋，而是这种生产制度本身。

四、资本把工人的生命当作可以消耗和替换的生产要素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的身体首先被当作劳动力的承担者。只要劳动者能够进入车间、操作设备、搬运材料并完成生产任务，他的体力、经验和时间就具有使用价值；一旦他因衰老、疾病或工伤无法继续创造利润，资本便会力图把责任推回劳动者本人。

这名工人已经61岁，却仍然长期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企业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年龄，也不可能看不到他长期处于高强度劳动之中。但只要他还能继续上班、完成任务，企业就会继续接受并使用他的劳动力。至于这种劳动是否正在透支他的身体，是否会使他失去健康甚至生命，往往不在资本的主要计算范围之内。

资本的账簿计算的是劳动成本、产量和利润，而不是劳动者完整的一生。工人需要睡眠、休息、医疗和家庭生活，需要在劳动以后恢复体力；资本却总是把这些时间看作没有创造利润的非生产时间，并力图将其压缩到最低限度。

在这样的制度下，劳动者的衰老也不会自然带来保障。只要养老收入不足、家庭仍有开支、重新就业机会有限，年长工人就可能不得不继续出卖劳动力。资本则利用这种处境，以较低的工资获得一个经验丰富、又不敢轻易失去岗位的劳动者。

因此，61岁工人仍然长期超时劳动，不应被解释为个人热爱工作或闲不下来，而应当看到其背后的社会条件。如果一个劳动者到了这个年龄，仍要依靠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维持生活，那么这首先说明工资、养老和社会保障没有使他获得真正拒绝过度劳动的能力。

企业在工人活着时强调他的责任心和劳动价值，在工人倒下以后却迅速强调“自愿上班”，这正体现了资本对劳动力的两种态度。能够创造价值时，他属于企业的生产体系；需要承担赔偿和责任时，他又被说成独立作出选择的个人。

换句话说，劳动成果被企业社会化地占有，劳动损害却被私人化地推给工人。工人完成的产量计入公司收益，长期疲劳、身体衰退和死亡风险却被说成个人健康问题。资本享受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却拒绝承担长期使用这种劳动力所造成的后果。

企业可能辩称，工人此前没有明确表示身体不适，也没有拒绝上班。但资本不能把劳动者没有倒下以前仍然能够工作，作为劳动条件安全合理的证据。许多长期过劳造成的身体损害，并不会在每一天都表现为明显疾病，而是在持续积累后以突发方式爆发。

况且，工人在雇佣关系中也未必敢于真实表达疲劳和身体问题。请假可能影响工资和全勤，拒绝加班可能被视为不服从管理，年长工人还可能担心因此被替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继续坚持，并不能证明劳动强度合理，只能说明他缺乏拒绝的现实条件。

资本还可以依靠劳动力市场不断替换被消耗的工人。一个劳动者因疾病、工伤或年龄退出生产，企业可以再招收另一个人。正因为单个工人看上去可以被替代，资本就缺乏主动保护其长期健康的动力。

对劳动者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对资本来说，劳动力却表现为市场上可以重新购买的一种商品。这种根本差别决定了，企业在没有外部约束和工人集体力量的情况下，总会倾向于把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推向更高限度。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安全生产仅仅理解为防止机器伤人或操作事故。长期超时劳动、持续缺少休息和对高龄劳动者的过度使用，同样属于劳动安全和职业健康问题。一个人在车间内没有被机器直接击中，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命没有被生产制度逐渐消耗。

真正的劳动保护，不能等到工人死亡以后才讨论赔偿。企业应当在日常生产中限制工时，保障休息，评估劳动强度，并根据劳动者年龄和健康情况调整岗位。监管部门也应主动检查，而不是只在事件曝光以后介入“协调”。

然而，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用工秩序下，劳动保护经常被压缩为事后程序。平时，企业以经营自主和市场竞争为由支配工时；出事后，再由家属承担举证压力，通过工伤认定、调解和诉讼争取补偿。资本对劳动者身体的长期支配被忽略，讨论焦点却被缩小为死亡当天是否符合某个程序条件。

这种制度把生命损失转化为赔偿金额，却回避了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企业能够长期安排或默许这种劳动？为什么一个61岁的工人需要承受如此长的工作时间？为什么企业直到工人倒下以后，才开始讨论其身体和劳动风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把人的生命置于生产之上，而不是把人当作资本增殖的附件。机器、厂房和生产任务都应当服务于劳动人民的需要，不能反过来要求劳动者用健康和生命维持利润。

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年长劳动者应当获得稳定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劳动时间应当随着生产力发展而逐步缩短，技术进步应当减轻人的负担，而不是让更少的工人承担更多劳动。衡量生产发展的标准，也不应只是产量和利润，而应包括劳动者的健康、寿命和生活质量。

这起事件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工人的身体被使用到最后一刻，而当他的生命停止时，企业却试图把整个过程解释成个人选择。资本想要占有劳动，却不愿承担劳动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需要的保护和保障。

因此，追究责任不能只停留在确认其是否当天自愿上班。必须调查企业是否长期过度使用劳动力，是否把年长工人置于不合理的劳动强度中，是否建立了职业健康和休息保障，以及管理者是否对长期超时劳动视而不见。

工人的生命不是一次性消耗品，更不是企业账目中可以折旧和替换的生产要素。任何社会只要允许资本为了利润持续透支劳动者的身体，就无法真正称自己尊重劳动，更无法称劳动人民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人。

现在招募：
编辑若干，文章写手若干，美工若干，宣传工作者若干。
我们需要同志们的投稿！你们所投的每一个稿，都会变成刺向中修的利剑！
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投稿和联系都请使用这个邮箱：
EmancipationofLabour@proton.me